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路径

郭 晗 任保平

内容提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其基本特征体现为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外需、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和资源环境的依赖。形成这种多重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约束,包括要素定价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财税激励机制。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要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和效益,将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短期因素转变为长期因素,将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调节需求转变为改善供给。要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路径依赖 破解路径 体制机制约束

郭 晗,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710127

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710127

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但从整体来看,经济增长依然过于依赖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是“转不动”?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在现有的体制机制背景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以及企业行为动机激励相容,从而形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

的经济主体对现行体制机制的适应性预期。由于正反馈机制的存在,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多重路径依赖,从而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锁定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模式中,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速度和低质量并存的基本特征。要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重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就必须找到导致路径依赖的正反馈机制,通过体制机制的转型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基本特征

路径依赖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和谐发展”(NCET-06_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以及西北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资助项目(YZZ12043)的资助。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 研究进展及中国启示

武 剑 林金忠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是近十余年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进展。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缘起,以及对其经典代表理论:空间生产理论、空间集体消费理论、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清晰梳理和系统归纳,并在此基础上与目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空间经济学进行比较辨析。最后,从空间集体消费冲突、空间生产同质化、空间产品分配两极分化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具有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空间政治经济学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武 剑,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361005

林金忠,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361005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从空间的视角,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研究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文献迅速增长,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随着该理论被引入中国、不断受到国内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已日益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方法。从目前国内看,该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在经济学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应用的文献却反而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整个

学术界,还没发现有专门的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体系进行较为完整归纳和总结。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促成“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诸多国际学者,其学术背景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界,因而在他们有关“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中也往往包含了大量哲学、社会学等其他问题论述,这使得该理论呈现给世人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其必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本文立足现有文献,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做出系统梳理,并提出有益启示,以期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空间经济的和谐发展提出新的理论参考依据。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当代金融主导型资本主义经济内在不稳定性问题研究”(项目号12YJA790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对组织绩效的混合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张 骁 杨 忠 徐 彪

内容提要 本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 181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考查了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这两种战略导向对组织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其与环境的匹配性。结果表明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会产生协同效应,正向影响组织绩效;在技术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更能够促进组织绩效。

关键词 技术导向 市场导向 环境不确定性 组织绩效

张 骁,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210093

杨 忠,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10093

徐 彪,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210093

一、引 言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成为现阶段我国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在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亟须解决“如何通过创新提升组织绩效”的问题。在组织绩效的众多影响因素中,战略导向一直备受学者们的重视,其中颇受关注的两种战略导向是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它们也正是促进自主创新的关键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和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中,但实证研究并不多,也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理论共识,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一,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统一。关于技术导向

对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较少,也缺乏肯定的结论。尽管在多数人看来技术导向可以使企业获得重大的、创造性的、引领性的技术突破,从而能够引领消费,超越于现有的竞争,获得更大的收益,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不一定会帮助企业提升组织绩效,其可能会耗费公司的资源,只有当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并在市场上表现出好的绩效时,技术对组织而言才有价值。而要保证产品有好的市场表现,必须在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许多学者开始探讨市场导向对组织创新绩效(张婧,2005)、经营绩效(谢洪明等,2006)的影响,但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显示市场导向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正向影响(Kohl and Jaworski,1990; Deshpande et al.,1993; Slater and Narver,1994; 王永贵等,2008),但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72060,71102033,7110203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2M510133)。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需求与供给

——制度变迁的视角

吕云超 崔开云

内容提要 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方式,其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原因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加以考察。当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制度需求源于固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释放出足够的空间以使社会中新的潜在收益得以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政府或者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和个人就产生了打破原有制度均衡,实现制度创新,以实现这些潜在收益。而法律秩序和政府态度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原有制度安排、以及国际社会因素的存在则构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条件。

关键词 制度需求 制度供给 非政府组织

吕云超,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 210023

崔开云,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10023

一、制度变迁释义

所谓制度,就是指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有意义的、认知的、规范的和管理的结构与行为^[1]。相应地,制度变迁也就意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认知的、规范的和管理的结构和行为的变化或演进。由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制度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组织的行动选择来加以实现。因此,从这层意思上讲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组织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具体说来,制度变迁主要包含组织行为的变化、组织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变化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

当下研究文献一般将制度变迁具体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等两种。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主

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相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3]。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变迁的需求;二是制度变迁的供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随着技术改变、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以及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以及交易费用等等因素的变化,社会中出现了新的潜在收益^[4],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则根源于原有制度集合不能将这种潜在收益予以实现的基本事实。潜在收益的存在诱使部分社会群体或者是个人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状态,作出制度创新的选择^[5]。

当然,仅仅有了制度变迁的需要还不足以形成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险支持研究

孙武军 周佳丽 谢红园 殷甜甜

内容提要 当前国内在文化产业风险管理与保险方面不但实践滞后,理论研究几乎空白。基于此,本文在重新梳理、归纳文化产业主要子产业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各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性质,抽取共性风险特征,总结出文化产业急需保险业介入的 6 条风险路径,为我国保险业切入文化产业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风险 保险支持 参与路径

孙武军,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10093

周佳丽、谢红园,南京大学金融与保险学系研究生 210093

殷甜甜,江苏省保险学会 210002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产业因其发展速度快、创造国民价值多、提供就业岗位多等原因,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1]。文化产业作为一国重要的服务产业,体系庞大、纷繁复杂,在向社会提供丰富精神产品的同时,自身饱受各种风险的侵袭。实践表明,文化产业发展成熟的国家或者地区,均获得了保险业的强力支持,保险业已经全面进入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的全流程,文化产业风险管理与保险已成体系。保险业通过提供风险保障、推出便捷服务、发挥投融资功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文化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而且有利于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扩大保险覆盖面,同时可以培育新的增长点,服务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和保险业,两者还未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关系。我国保险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明显不足,保险业参与文化产业的形式单一,渗透度不高。保险公司目前一般只涉及开发和最终保障过程,很少参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全过程。这集中表现在:首先,在开发保险产品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口,已经开发的险种不完善且形式单一,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风险没有被覆盖^[2]。其次,对文化产业缺乏系统性支持。文化产业往往存在可抵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70972032)“双边市场中企业竞争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批准号 08AJY029)“我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PAPD)和江苏省保险学会课题资助(SBX(2012)14)。

论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的建构

——基于江苏镇江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实证分析

周秋琴 张水娟 孙文平

内容提要 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的“和谐劳动关系”，其实质是广大普通劳动者合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的核心，是建立起劳动关系双方的集体协商机制，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关键词 企业和职工利益 共享机制 集体协商制度 镇江地区

周秋琴，镇江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副教授 212003

张水娟，中共镇江市委党校副校长 212003

孙文平，镇江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教授 212003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劳动关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职工合法权益实现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当前企业劳动关系矛盾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主体。

本文以江苏镇江地区工资集体协商调研数据为依据，描述了工资集体协商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并尝试从制度上寻求突破。

一、工资集体协商的价值

集体谈判萌芽于 18 世纪末的英、美等国，是西方国家劳资双方确定职工劳动条件的博弈机制。然而，直至 19 世纪末，各国政府仍然将集体谈判作为一种违反契约自由、妨碍自主竞争的行为而不予支持。20 世纪初，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西方各国立法逐渐放宽对集体谈判的限制，先后颁布相关法

律，集体谈判开始有法可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集体合同覆盖率，美国为 15%，日本为 20%，欧盟国家则平均达 67%（其中奥地利达 98%，法国约为 95%，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为 90%）^①。

“集体谈判”这一术语是英国学者西德尼·韦布与比特莱丝·韦布夫妇首倡的。他们认为，工人们团结一致推选出代表并赋予其以整个团体的名义与雇主进行谈判的做法，大大改善了其在就业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与此同时，雇主也无须与劳动者分别谈判并签订个别劳动合同，只需要一份满足集体意愿、规定集体劳动条件的协议即可^②。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核心机制。在我国，考虑到法律、社会性质的产权现状等国情需要，加入人文关怀，它强调劳资双方的平等对话，将西方国家的集体谈判叫做集体协商。